

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下）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侯惠勤教授

被采访人：侯惠勤

本刊记者

（接上期）本刊记者：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怎样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进行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

侯惠勤：“冷战”结束后时代发生了的一个新变化，就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这一时代特征造成了三大后果：一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竞争的核心，所以，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具有首要的政治价值，实际上也成为任何执政党实现领导权的最根本根据。二是社会主义必须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全球性的，而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必须融入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否则，很难找到发展的机遇。三是经济相互依存性的加大和世界多极化趋势使得今天的世界和平较有保障，世界大战在较长的时期内打不起来，我们可能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加快国内建设。对抗可能让位于对话、“零和游戏”可能让位于合作共赢，这是现时代正在显现出的大趋势，因此，一方面，求同存异、不搞对抗就不仅成为不同国家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也是意识形态调整的大方向；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又使得坚持不同于西方价值观和话语的努力变得比较困难。

问题在于，既不能一成不变地按照原来的方式坚持社会主义，而必须加强包括话语转换在内的理论创新，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又要旗帜鲜明，强化而不是淡化我们的身份特征，这就需要在寻求共性话语中坚持独立性。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其意识形态内涵而言，是共产党执政的核心理念的重大突破。它表明党的领导方式将越来越法治化，其执政基础将越来越转移到三个基点上（即一个是发展，一个是文化创新，一个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利益整合方式越

来越向制度整合方面倾斜。这就不仅构建了新形势下中国同世界合作对话的平台，而且体现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看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思想原则。

而就话语创新而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都突出了以爱国主义为内核进行话语重组，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高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我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既不是对抗世界文明的民粹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也不是淡化意识形态界限的实用主义，而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背景的新型爱国主义。它承继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和长期革命传统，立足“一国两制”以及国家主体部分实现社会主义的事实，放眼各种文明共存交融的未来，担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使命，因而富有时代气息和生命活力。

以爱国主义为内核重组意识形态话语，就能既尊重历史，又面对现实；既体现鲜明的价值取向和原则立场，又突出国家整体利益和求真务实理念。邓小平在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时明确提出的港人治港的界线和标准，即港人治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邓小平的这一表述就是这一意识形态话语的最好脚注。从表面上看，邓小平对于爱国主义的界定丝毫没有提及社会主义一类意识形态鲜明的话语，然而却不难发现其中高扬的社会主义旗帜。首先，谁使中国人民恢复了民族自尊心？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正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殖民地奴性文化，造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普遍麻木、没有国

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造成了崇洋媚外的文化心态。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而是在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了，并以世界大家庭平等的一员、以充满自尊、自爱、自强的新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因此，当代中国的爱国者，必须具有民族自豪感，必须尊重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次，是谁使中国恢复了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是所谓的大清帝国，也不是中华民国，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与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到香港问题时，义正词严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鲜明立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否则，就是晚清政府、就是李鸿章。“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香港的成功回归，是爱国政府代表全中国人民意愿洗刷国耻的典范。

其三，是谁在香港回归前后致力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不是港英政府和所谓的“民主斗士”，而是中央人民政府和广大的爱国爱港人士。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及保持香港回归以后的安定繁荣，邓小平不仅极富创意地提出了“一国两制”，而且以博大的胸怀在不同时期、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要照顾到各有关方面，要对“祖国人民”、对“香港人民”以至对“英方”都要有利，并且确保“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化，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真正的“大中华”。正如小平指出的，“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

对话也是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的抗争。在经济全球化（其在20世纪80年代已初露端倪）的背景下改革开放，所面临的一个主要价值观的冲突，就是人权和主权的冲突。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确实存在着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他国内政倾向，其背后的理论就是“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终结”，“人权高于主权”；另一方面，又确实存在着把经济全球化简单地归结为资本主义化、因而拒斥全球

化、甚至反对改革开放的倾向，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仍停留在“冷战思维”上。在邓小平看来，经济全球化问题很复杂，不能简单化，但是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必须顺应这一趋势，因势利导，发展自己；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世界的最高利益实体。因此，必须在就人权问题的对话中坚持必要的斗争。

说人权高于主权，首先不符合事实。正如邓小平所讲的：“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在今天的世界现实中，个人的命运还是直接地、紧紧地同民族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没有国格就没有人格，没有国权就没有人权。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表明，当下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世界一体化，而是以民族国家为背景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发达国家对于贫穷国家的冷漠、其以国家利益为转移的内外政策以及诸多践踏人权的不良记录，证明西方价值观并非普世价值，其宣扬“人权高于主权”无疑是伪善的。

本刊记者：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怎样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底线不动摇的？

侯惠勤：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不是“向西方文明回归”，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因此，保持意识形态的连贯性不仅是稳定大局的策略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变革、调整，是坚持前提下的发展、继承前提下的创新，因而是一脉相承下的与时俱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例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可能会因其不处于当代实践的中心而有所忽略，然而这决不意味着要把它推倒；对于敌对意识形态间的公开较量，例如国际敌对势力的分化、“西化”图谋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虽然一般不会被提到重要的地位，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我们会放松警惕、放弃斗争。

毫无疑问，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的冲突一般不会采取激烈的方式进行（这也是亨廷顿断言其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的依据），中国在反倾向斗争时也决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不会再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然而这种冲突还是客观存在的。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看，如果触动了中国意识形态的底线，它则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底线大致有三：第一，不许干扰经济和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

聚精会神搞建设，是当代中国必须牢牢把握的大方向，它确实不能被其他事情牵扯精力、偏离方向。因此，稳定压倒一切，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是中国一向坚持的基本方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几次重大的政治较量，例如坚决平息八九风波和揭批“法轮功”，无一不是因其制造政治动乱和政治风波引起的。邓小平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表态：“我们搞现代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不排除动乱的干扰，一切无从谈起。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所采取的有节制的反击，无论是针对国际霸权主义还是国内政治动乱，都是为了稳定大局，为改革、发展奠定必要前提。

第二，不许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地将“四项基本原则”定位为立国之本，使之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中国之所以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除了上述维护国内外稳定大局的需要，还是培育民族精神、形成共同理想、增强国家凝聚力的需要。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的价值概括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其中关于发展中国之价值，不仅指的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包括培育“四有新人”（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协调先富后富、形成共同理想和大局意识，以确保人民团结（不分裂）、社会和谐（不动荡）和超常规发展（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社会主义不仅是发展的保障，也是发展的原则和方向。在继承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发展观，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和以人为本的精神，突出“五个统筹”（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国内外、人和自然）布局，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推倒“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毁灭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第三，不要指望控制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一个特殊的国际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使得中国争取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和现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又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着重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来自世界霸权主义。它总是力图左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总是不断地为中国的发展设置障碍，总是企图让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扮演不平等的角

色。对于这种企图，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都不允许它按照西方设计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而必须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否则，将不仅对于中国是一场大灾难，对于世界也是一幅难以想象的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不断开拓，本身就是对于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伟大贡献。

本刊记者：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

侯惠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强大动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在中国步入新世纪后，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又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它标志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又一次新的飞跃。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摆在突出的位置，并明确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精髓以及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四位一体”的价值体系。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视角看，此举传递了我国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的若干重大创新信息，是继邓小平“文化大革命”以后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全局后的又一重大战略性转变。这一转变是在深刻把握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以及认真吸取国内外意识形态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所面临的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阶段性特征日渐清晰，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机遇大于挑战的总形势日趋明朗。在这样的历史大格局下，意识形态领域正在发生三大新变化：一是意识形态的感性化趋势。文化要素越来越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逐步由主要通过政治方式，向以文化为主要表现力的综合方式转变。作为意识形态内核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日益与文化结缘，更多地借助文化消费和道德情感获得更加广泛而卓有成效的传播，逐步内化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二

是意识形态的学术化趋势。当前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标签的刚性特征正在逐渐被学术研究的理性话语所替代,意识形态日益渗透到学术研究之中,通过学术思潮、学术话语等加以表达,通过学科建设和国民教育体系扎根,二者日益融合。三是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趋势。各种意识形态以其特殊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符号,以长期潜移默化功能作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附着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

总之,在当今世界,一方面“再意识形态化”有所表现,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发挥重大作用的倾向有所增强。适应意识形态的这种变化,不仅是有效发挥意识形态自身作用的需要,更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国科学发展的需要。这样,我们就必须深入到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矛盾关系中,把握其变化规律。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现实针对性来看,可以提出至少三个“两点论”及其具体关联性判断: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迅速提升,但国家“软实力”的建设相对滞后;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标志的党的理论创新生气勃勃,但这一理论创新成果的大众化、普及化以及国际化相对薄弱;三是文化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但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增长更为迅速,文化供给(尤其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对不足。这三个“相对”,是我们把握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因此,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视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意识形态基本矛盾关系认识的一个重大飞跃,同时又提出了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本刊记者:怎么认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关系,这些矛盾关系给我们提出了哪些新课题?

侯惠勤: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矛盾关系看,面临这样一些新的课题:一是意识形态的排他性与包容性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二是意识形态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三是意识形态的集团性话语与个体性、人类性话语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四是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和大众性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

本刊记者:怎样理解意识形态的排他性与包容性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

侯惠勤: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是通过不断地对是非、善恶、美丑进行泾渭分明的区分,使自身的价值得以彰显,从而获得广泛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

说,旗帜鲜明理所当然,模糊界限就意味着消亡。但也必须看到,一般地说,包容多样不仅是社会和谐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精神发展所必需的文化生态,因而也是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真正发挥作用的需要。特殊地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是自我封闭的僵化体系,它不仅要从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同时也必须从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中吸取营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道德精神扩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这一发展趋势。

在这一新认识基础上,我们又必须面对两大新挑战:一是在涵盖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庞大体系中如何体现“核心”价值?我们必须从中提炼出与人类文明同进步、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根源、与科学社会主义同命运的核心价值观念,通过不懈的努力使之成为人民大众的自觉追求,才能真正凝聚人心和引领社会思潮。具体地说,我们既不能完全排斥自由、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发展中形成的价值理念,因为它们确实有两重性,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类一定时期的共同追求,但决不能照搬。这不仅因为这些口号总是同资本主义的制度架构相联系,因而具有局限性以及一定的欺骗性而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断揭露,更因为社会主义作为必然要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生事物,不仅要逐渐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要不断创造出更能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要求的思想文化成果,尤其是核心价值理念。

二是当我们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原则时,其批判性原则就必然遭遇新挑战。我们今天随时可以看到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象,从各种“左”右政治思潮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属性,到社会生活中各种根本颠覆真善美和假恶丑价值取向的现象,有的已经非常严重,令人忧虑。然而问题还不在于此,错误思潮和不良社会现象的存在不是新情况,现在的问题在于当“宽容”成为一个社会共识时,“批判”就必须为自身的存在寻求辩护。“谁有资格批判”往往成为一切批判的前置性条件,当人们无法理直气壮面对这一质疑时,一切批判就无从谈起。我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就是等待各种过错者的“良心发现”,或者是等待其自生自灭。这就是今天许多正常的政治批评、学术批评无法展开的深层次原因,也是我们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性社会思潮所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本刊记者：怎样认识意识形态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

侯惠勤：虽然关于意识形态和科学的统一在今天受到种种质疑，然而毫无疑义，意识形态区别于宗教的显著之处，就在于它依托的是“理性”，而不是“心灵”。所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历来凸显其科学性特征，强调依靠理论的彻底性说服人，依靠真理的力量打动人。但是，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化体系化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作用机理本质上是情感认同，真理认识也要通过调动激情的方式才能奏效。换言之，通过很感性的方式表达很理性的观念，是意识形态进入大众“头脑”的通道。在今天，意识形态感性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说服力的挑战十分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在更加注重理论彻底性的同时，尤其要注重实践方式的创建。虽然理论学习、思想教育是我们的传统优势，但其如何进行更贴近生活和群众的改进，已成为形势所迫。此外我们还必须大力拓展其他可以负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方式，尤其在与群众生活密不可分的文化消费领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爱国主义、荣辱观这些本质上是道德情感的内容包含其中，表明我们在应对当代意识形态新变化上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其突出建设的要求，预留了实践创新的广阔空间。

在这方面我们遭遇的新情况，主要是由当代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所引发出“非意识形态化”倾向，导致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的消解，从而为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渗透打开缺口。在今天，政治厌倦甚至是政治虚无的情绪比较突出：许多人不仅躲避政治，而且妖魔化政治；一些人习惯地用“非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认其根本属性就在于“不问姓社姓资”；文艺界的一些名人公然声称文艺作品只有“好看”和“不好看”，而没有什么“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等等。“非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是抽象人性论的泛滥。把社会矛盾的最终解决归结为抽象人性（良知、爱、同情心、容忍等），把人性不仅视为超阶级、民族、历史阶段的抽象存在，而且视为可以创造一切“奇迹”的神奇力量（例如甚至可以改变物种本性，使“狼爱上羊”一类），是今天许多文艺作品（包括一些被认为是较优秀的作品）的通病。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反对讲人性，但有两个“底线”：一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性就不是“均匀”地分布在每个个体上，而是在不同的社会

群体呈现出不均衡状态，因此，讲人性和阶级分析并不对立；二是人性并非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相反，人性的修复和不断完善，有赖于社会的改造和历史的发展，因此，讲人性必须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不是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人性。

本刊记者：怎样认识意识形态的集团性话语与个体性、人类性话语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

侯惠勤：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集团性话语，它并非个人从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本质确实是“灌输”。但是，最佳的“灌输”是使国家的需要转化为公民个人的追求。回顾我们过去的意识形态“灌输”，教育和支配的目的性比较明显。这一方式在需要高度统一意志的革命年代非常必要而且效果显著。但在个人和个性问题日益突出的和平时代，在坚持灌输原理的同时，就必须更加注意将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结合起来，注意将国家意志转化为个人意志并通过个人意志发挥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本质上属于个人道德自律的荣辱观纳入其中，表明我们意识形态建设的落脚点已经从偏重“外部”灌输转向注重“内外共生”。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虽然实际上是一定利益集团的观念表达，然而其最具渗透力和影响力的方式却是让思想穿上“普遍性”外衣，才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同。人类性、全民性诉求形式下的集团性思想和利益表达，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然不能排除人类性话语，不能孤立、抽象和无条件地使用阶级性话语，而必须根据历史发展的具体实际，把阶级性话语和人类性话语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当然也不能拒斥阶级性话语，孤立、抽象和无条件地使用人类性话语，纠缠于同资本主义大打“普世”牌，比谁的迷魂汤威力更大，这肯定没有出路。

我们今天所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看待“普世价值”？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以下三点是基本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并不笼统地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指明它的基础在于人类利益共同体，因此只能存在于原始共产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而如果缺乏这种共同体的支撑，“普世价值”只能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望

或幻想而存在(例如关于“世界大同”的想象及各种乌托邦的追求),不具有实际的意义。二是由于阶级社会的利益分化(从世界范围看,我们现在仍然没有超越这一历史阶段),人类性话语和普遍利益的现实表达只能通过处在上升时期新阶级的阶级意识,“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而工人阶级由于根本区别于以往的任何阶级,因而开拓了一种通过工人阶级的阶级性表达人民性乃至人类性的现实可能。三是在今天,通过否定阶级性话语而抽象地谈论“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西方话语霸权的表达,是其“西化”、分化我国图谋的具体方式,也是当代中国产生价值混乱的一个根源,其目的是割断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与社会主义的联系。例如,我们把夺取特大抗震救灾的伟大阶段性胜利首先归结于“制度优越”,因而要唱响“六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人民群众好、伟大祖国好),可是就有那么一种力量,努力把抗震救灾的胜利抽象化为国际社会慈善行动的胜利、尊重生命和个人价值的人性论胜利,摆脱了一切主义纠缠的“普世价值”的胜利等,就是避而不谈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确实就在于如何把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及时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虽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今天更多地遇到了人类性话语的挑战,但我们还是必须坚持阶级性、人民性以致人类性的统一前提下应对,而不能通过淡化阶级性大谈抽象的普世价值。可见,在“四位一体”(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始终是灵魂。

本刊记者:怎样认识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和大众性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

侯惠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适应人民群众对于先进文化的需求而提出的,目的在于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因而它必须体现时代潮流、时代精神和时代发展,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同时,意识形态要渗透到社会生活,成为社会的“粘合剂”和“混凝土”,必须具有大众性和广泛性。以往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性方面的一个缺陷,就是所谓的“曲高和寡”,可操作性不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扩容”和“分层”的方式,取得了先进性和大众性相结合的大突破。“四位一体”不仅是“扩容”,同时也是分层:马克思主义指导作为这一价值体系的灵魂,不仅是内核,而且其主要对象是共产党员,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不仅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政治基础,也是全国人民最大的价值共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不仅为国内人民(包括港澳台等境外)所认同,也为海外华侨广泛认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当代人类所认同,实现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与世界文明潮流的对接;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主要对象是个人,目的在于增进每一个人的道德自律。这种层层递进、“分层”实施、各有侧重而又点面结合的价值体系,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分层实施从其挑战性后果看,就是可能使“分层”变成“分割”,造成主流价值观自身的“多元”、“多样”、“多变”,从而消解马克思主义。不难理解,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作“西化”或“僵化”的解读;不与社会主义中国相联系,爱国主义就会窄化演变为民族沙文主义,或者泛化演变为复古主义;不与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相联系,改革创新就会演变为割断历史的虚无主义,或者演变为“全盘西化”的洋奴哲学。这样看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实际上就包含着双重引领:就其内部而言,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能有效整合这一核心价值体系各组成部分,使其真正成为整个价值体系之魂,并使整个价值体系成为有机整体,而不是松散的“板块”;就其外部而言,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有效整合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使整个社会精神生活在多元文化生态中健康向上、充满生机活力。前一引领主要是“体系构建”,后一引领主要是“功能发挥”,两者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是一个互动的开放过程,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文化良性发展的强大动力。

责任编辑:蒋旭东